

## ●清华风物

## 清华大学“图书馆”题名寻踪

○韦庆媛(教)

编者按：本栏目连续两期刊登了关于图书馆题字的文章，图书馆韦庆媛老师通过合理推测、多方求证，认为30年代“图书馆”题字者有可能为胡汉民；日据时代，图书馆题字仍存，直到1952年才被除去。现在的题字，无论鲁迅说、郭沫若说均需要更详实的证据。

## 一、20世纪30年代“图书馆”题名为何人所题？

关于图书馆二期正门上方的“图书馆”题名，黄延复先生在《清华园风物志》中提出是于右任所题，苗日新先生在《导游清华园》中提出是郭沫若所题。因为找不到文字记载，这个问题的确存在疑问。

民国时期有著名的四大书法家，谭延闿擅长楷书，吴敬恒擅长篆书，胡汉民擅长隶书，于右任擅长草书。他们不仅擅长书法，还在国民政府中身兼要职。曾作为蒋介石秘书的罗家伦1928年出任清华校长后，强化了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联系，原挂在清华大学二校门上的“国立清华大学”牌匾由擅长楷书的谭延闿题写，“机械工程学”由擅长篆书的吴敬恒题写，依此看来，居于学校重要地位的“图书馆”题名也应出自于大家之手。

图1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老馆员李继先和陈荣恩留下的照片，由李继先的

儿子李豪提供。原片注为“1931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”，背景是1931年11月刚建成的图书馆二期建筑。李继先（1907—1993）和陈荣恩（1908—1992）1930年9月到清华图书馆工作，1933年1月22日在工字厅举行了简朴、热闹的婚礼，由梅贻琦校长担任证婚人。从照片的拍摄时间和人物穿着判断，竣工的同时或不久，“图书馆”题名即刻写到新大楼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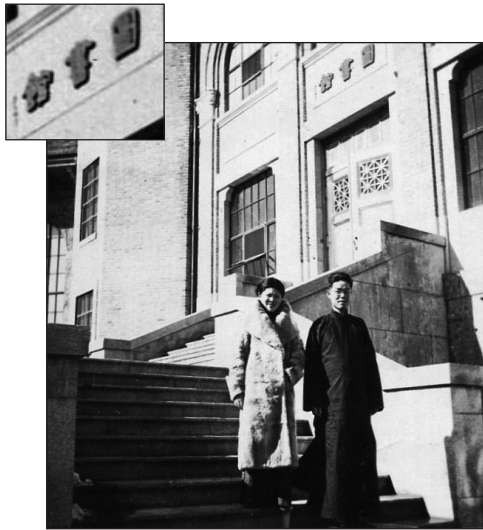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李继先（右）、陈荣恩（左）1931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门前合影

图1照片中“图书馆”三字为繁体字，书写顺序从右至左，用隶书书写。“图书馆”题名左侧有落款，可惜落款无法辨认，

## □ 荷花池

不知为何人所题。

于右任工草书，有“当代草圣”之誉。2010年出版的《于右任书法大字典》几乎收录了于右任的全部字体，仔细查看，清华的“图书馆”三个字，与于右任的“图”、“书”、“馆”三字笔法并不相像。

从题字的特点来看，“图书馆”题字为隶书，在民国四大书法家中，胡汉民擅长隶书，笔者给出另一种可能，“图书馆”三字是否为擅长隶书的胡汉民所题？胡汉民于1936年去世，享年57岁。英年早逝，留下的书法作品不多，无法一一查考，在此也希望保存清华大学图书馆早期照片的人士提供帮助，以便有更多的直接证明。

### 二、“图书馆”题字何时换了模样？

图2是刊登在《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房93、94班毕业40周年纪念册》上的照片，摄于1957年1月。



图2 房93班女同学在图书馆门前留影，从左至右：潘清漪、匡敏玲、刘学孟、刘越清、王娴明、应诗慧、程瑞棣、沈淑芳、陈华丽、雷锡珊（1957年1月）

从照片上可以看出，1957年“图书馆”题名与20世纪30年代的题名明显不同，已经被更换过，左侧落款已被刮掉，新的题名没有署名，每个字周围隐约可见原来题名钉在墙上的痕迹。

那么，30年代的“图书馆”题名是什么时候被更换？为什么要更换呢？

有人推测，在日军侵占图书馆期间，“图书馆”题名被刮掉了。抗战期间，清华大学变成日军第一五二野战医院，图书馆成为医院本部，馆内藏书一本不剩，破坏非常严重。但从资料来看，日军主要是为了使用方便，而将馆内设施进行改装，未见对外观破坏的记载。

据黄延复先生回忆：清华解放初期，曾经有过一次集中清除建筑物上的“反动遗迹”活动，期间，包括西体育馆外廊里的老罗斯福像、大图书馆大门上的于右任字，都被清除掉了。

看来新中国建立初期，为了挥去不合时代音符的烙印，曾经对清华大学的“反动遗迹”进行过集中清除，包括“图书馆”题名在内。实际上，从1951年5月份起，已经开始在图书馆清除反动书刊的行动，学校成立专门委员会，“协助图书馆馆长检查图书馆现存政治上反动之书籍”，撤除后的书籍另行封存，不再流通。试想，如果“图书馆”题名为胡汉民所题，当时刺杀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的重大嫌疑足以使他的题字被去除。同时谭延闿题写的“国立清华大学”匾匾也被去除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国民党右派吴敬恒题写的“机械工程学馆”却保留下来。

图3是刊登在《清华大学建筑系一~四届毕业班纪念集》上的清华大学建筑系

1952年毕业生姚富洲在图书馆前的留影，标注的照相时间是1952年，从衣着与植物情况判断，应在春夏或夏秋季节，图书馆大门上方有题名。



图3 清华大学建筑系1952年毕业生姚富洲在图书馆前留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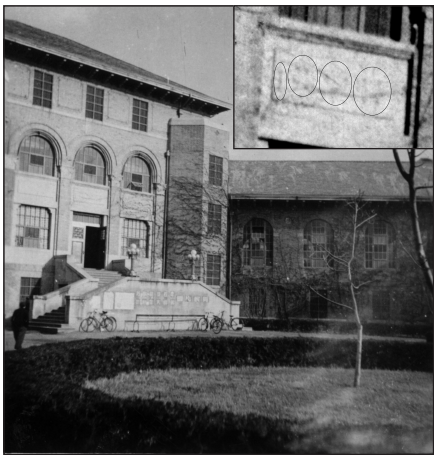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1952年的图书馆

图4是张思敬老师（1952土木）1952年拍摄的图书馆外观照片，照片上可见爬墙虎叶子掉落后的筋骨，拍摄的时间应在深秋。在图书馆门前梯形台阶的外墙上写着：“苏联战后五年计划伟大成就

图片展览”。1952年新中国正在准备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，1952年8月17日—9月22日，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，就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和苏联交换意见，争取援助。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，图书馆举办了展览，这也证明此照片摄于1952年深秋无疑。而原“图书馆”题名位置，已经没有“图书馆”字迹，仔细辨认，墙上原字除掉的痕迹清晰可见，因此可以断定，1952年夏秋之际，原“图书馆”题名被除掉。

由此判断，至迟到1957年，“图书馆”题名已经被更换。新的题字何时挂上去的呢？

笔者请教了清华大学原庶务科田书林老师，据田书林回忆：“大约在1953—1954年左右，办公室来了两个人，不清楚来人是从哪里来的，拿来打造好的‘图’、‘书’、‘馆’三个字，字是铸铜的，立体的，每个字独立，每字笔画连在一起，是一个整体，我拿起来掂了掂，‘啊，好沉呐！’来人请庶务科把字挂上。当时在场的还有庶务科科长段多朋以及科员田光远，段多朋表示：‘这事儿不属于我们这里管，你找找别的部门吧。’来人就把手拿走了，不知道字后来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。”

当时的庶务科长段多朋已于上世纪90年代去世，田光远在“文革”期间下放鲤鱼洲农场时出了事故，溺水身亡，因此已无从仔细查考，但田书林先生非常肯定地说：“这事儿确实有。”

新的“图书馆”题名最晚在1957年挂到了原题名位置，但究竟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，同样因为没有文字资料，也需要

## □ 荷花池

更多的照片资料给予佐证。

### 三、20世纪50年代“图书馆” 题名为何人所题？



图5 现在的“图书馆”题名

图5是现在的“图书馆”题名。与1957年的“图书馆”题名比较，是同一个字迹，虽然看上去字迹有些变形，那可能是因为拍摄角度不同，字迹应该是没有变过，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每个字周围原来题名钉在墙上的痕迹，这些痕迹与1952年、1957年的照片上的痕迹一致，也就是说，1957年以后，“图书馆”题名再没有更换过。

据曾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的陈杰渝回忆，他和图书馆党办张宪云老师一起去看望离休老馆员赵正民（2006年去世），赵先生告诉来客：“图书馆”题名在建国初期更换过，是从鲁迅先生的遗字中集出了“图”、“书”、“馆”三个字，挂到原来的位置。以后赵先生还几次提到此事。赵正民先生于建国初期负责图书馆的总务工作，而更换题名的事情是由总务负责的，赵先生是亲身经历者，他应该是知道其中的变故。

为了确认“图书馆”题名是否是集鲁迅的字而成，2012年2月，笔者请教鲁迅博物馆黄乔生副馆长，对鲁迅先生及先生的字体素有研究的黄馆长非常肯定地

说：清华的“图书馆”三个字不是鲁迅先生的字，有点像郭沫若先生的字。于是笔者又请教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室的钟老师。郭沫若纪念馆的馆长正是郭沫若先生的女儿郭平英女士，钟老师也请郭平英馆长进一步辨认，认为应该是郭沫若先生的笔迹，郭平英馆长表示：“只是字看上去有点扁。”看来，清华大学“图书馆”题名确为郭沫若先生的笔迹。

郭沫若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曾经为很多图书馆题名，这些题名基本上都留下了“郭沫若”的署名。题名活动一直持续到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，据《郭沫若书信集》记载，1969年5月21日，郭沫若在给五弟翊昌的信中提到，翊昌想请郭沫若题写毛泽东主席诗词集联，郭沫若回信：“你要我为你写成对联，我不便写。因主席年前有指示：‘我们不要题字’。我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便没有为人写字了，细想挂对联这样的习惯也是须得破除的。”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开始后，郭沫若先生题名活动基本停止。

老馆员赵正民先生作为亲历者，他的说法不容忽视，“图书馆”的题名更换过是肯定的，但是关于新的题名是集鲁迅字的说法，是否是因为赵正民先生记错了呢？换过的“图书馆”题名没有署名，郭沫若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的题字很多，没有署名的很少，而为清华大学图书馆题名，没有必要不留署名，这是否验证了“集字”之说呢？只是集字的人混淆了。选择郭沫若先生的字，是否和郭沫若先生1950年在清华做过一次演讲有关呢？又因为“集字”之说，而“只是字看上去有点扁”呢？